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汉语词义学

苏新春 著

出 版 社
任 责 任 编 辑
封 面 设 计
出 版 行
址 址
址 址
副 本
本 次
次 号
号 份
份 宝

1 次印刷

ISBN 978-7-2600-7694-5

30.00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义学 / 苏新春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7
(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
ISBN 978-7-5600-7694-2

I. 汉… II. 苏… III. 汉语—语义学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4660 号

学义同语好

善 卷 燕 燕

出版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王琳

封面设计: 袁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694-2

定 价: 30.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6940001

京北

出版说明

“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丛书”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同厦门大学中文系苏新春教授、鲁东大学（前身是烟台师范学院）文学院张志毅教授共同拟定的。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对建国以来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作一个历史总结。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自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和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开其风气，兹后几代学人先后承接，出版、发表的论著、论文蔚为大观，数量之多，几乎使人目不暇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著作后来未能再版，或虽再版但早已售罄，今天的学子如欲一观，实属不易。我们以丛书形式将这些著作重新出版，既是对前贤学术成就的一种纪念，也是给后学指示治学之门径。

收入丛书的十种著作都是经与有关学者反复商议而定的，大体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但也有遗憾，由于丛书规模的限制，有些原本很优秀的著作未能收入，或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未能拿到出版权，最后只好忍痛割爱。这是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由于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主要是反映已然的历史成果，所以我们对原书采取的处理原则是尽量保持原有面貌，编辑的改动仅限于个别文辞的调整。像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从报纸连载到现在差不多快五十年了，书中所举的许多语言材料尽管在当时是最新词语，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词汇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同当时作者的“预见”截然相反的情况。书中的个别观点和语言表述在今天看来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他一些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很正常，因为这些著作“史”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论”的价值，大可不必强改故书以就

今论，希望读者理解。

第三，这套丛书还收入了几部未曾出版过的新著，目的是在作历史总结的同时也能反映当今词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汉语词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从表层的描写转为深层的解释，从词的结构分析转为语言理据的探求，从单个的语义分析转为对汉语语义系统整体结构的认识，从平面的语言研究转为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的立体考察。这些转变标志着传统词汇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全面革新。另外，我们还想借最新入选的论著向读者表明，本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还会有更多的词汇学新著走入这个系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年7月

丛 书 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部经过一段筹划，终于隆重推出“现代汉语词汇学丛书”，第一批出十本。序齿列锦：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语文学习》1955—1957；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二）

刘叔新《词汇研究》（新选论文集）。

符淮青《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语文出版社，1996）。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新选论文集）。

周光庆《从认知到哲学：汉语词汇研究新思考》（新著）。

张绍麒《汉语结构词汇学》（新著）。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周荐《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1995）。

遗憾的是，因为版权关系，有些书不能如愿编入本丛书。如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开山之作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

本丛书的作者老少年龄相差43岁，有国学渊博的宿将，也有中坚和新星。出版时间先后相差46年，内容有开垦探索的讲话，承前启后的概论，别树一帜的描写，朴实创新的分析，思辨独特的新论，务实严谨的史论。总之，有传统的平实，现代的新潮，当代的前卫。

本丛书是现代汉语词汇学的轨迹史册，是语义学的一条源水，是信息处理的一块基石，是语文辞书的一支血管。一个语文辞书出版单位的信誉，是跟其出版物的学术含量成正比的。

本丛书反映着词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个转化有三个背景：哲学的现代化转向，其号炮发自19世纪末；语言学现代化转向，其号角吹起自20世纪初；语义学现代化转向，其启明星升起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欧美人不太注意的领域——词汇学，其现代化转向的信号，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才从莫斯科学派传出。至今，现代词汇学已经比较明显地带上了四个特色：

(一) 现代哲学特色。西方近一百年来现代哲学的主流是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其关于语言要素、意义、结构、类型、功能、实在、意识、真理、演绎法、分析法、定量分析、整体论（跟原子论相对）、多元论（跟一元论相对）等哲学思想正在启迪词汇学的新智慧。

(二) 现代语言学特色。受现代语言学影响，词汇学形成了双轨模式：一条是继续沿着前期轨道前进，诸如语言系统论、价值观、语言言语二分说、共时历时双坐标思想、聚合组合（静动）双向原则；另一条是沿着后期轨道前进，诸如从一元到多元（指研究单位）、从自治式的微观到非自治式的宏观（跟多学科和外语因素结合）、从单语的个性到多语的共性、从单层面到多层面（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及其内部各层面）、从描写和理论到解释和应用。

(三) 现代语义学特色。现代词汇学正在成功地吸收着现代语义学的一些成果。诸如语义场理论、义素分析法、义位的多元多层次语义特征、义位之间的关系：同义、反义、多义、（同音）异义（以上为传统的四种），上下义（蕴涵、层次）、总分义（总体及部分，即拥有关系）、类义（并列、互补）、交叉、序列、义族（派生、构词）、依存、比例、组合（以上为现代的九种），转换、同义派生、题元、场所、工具、方式、声响、指小、指大、特征、良好、不好、进程、开始、停止、使出现、使不存在、实现、使实现、使就绪、变坏、侵害、表现、处置、来源（或指向）、完成、单位等等（以上为当代七十多种词汇函数）。

现代词汇学也正在尝试吸收语用学成果。如义位的语境动态真值、义位的语境变体、义位的语境特征等。

(四) 数理特色。受数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的影响，特别是受数理语言学的直接影响，现代词汇学必然具有四个数理特色：计量特色，形式特色（数学模型、公式、结构式、形式符号、图表），计算机特色（巨型语料库以及由此导出的词汇词义各种定量分析），模糊特色（模糊义研究，由此促进计算机模糊程序的设计以及模糊计算机的研制）。

词汇学，尤其是汉语词汇学，其路漫漫而修远，必将上下中外而求索。愿同道用志不分，共襄盛举。本丛书是蓄水引龙的海湾，现代理论词汇学跃出龙门已经指日可待。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由苏新春教授提议的，并做了一些发起和联络工作。外研社汉语部的彭冬林、严学军、金艳艳等先生的敬业精神十分感人，他们确有成效地进行规划、组稿、审编，用辛勤劳动构筑一座座文化景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有识之士的引导下，以雄厚的学术为基石，以现代的理论为基础，建构一座举世瞩目的经籍珍品大厦，计日程功。

奉序为贺。

张志毅

2005年7月2日

卜居地芝罘

序一

唐启运

《汉语词义学》是苏新春同志的一部独具匠心、别开生面的专著。这本书有很多独到之处，这里择要说说其完整性、系统性、继承性和开拓性的特点。

一、完整性。作者从结构、人文、方法、史论等四大方面对汉语词义各个大大小小的层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其中结构篇，作者深刻地阐明了汉语词义的整体属性和基本形态，阐明了汉语词义的系统性和汉语基本词汇的广义性，阐明了汉语词义的构成特点和演变情况，阐明了汉语词义与其表现形式的辩证关系。凡此等等，规模宏大，不乏宏论，工力至深。

二、系统性。词义的研究，不能零敲碎打，不成理论。这本书的作者一个很重要的基点就是始终坚持把汉语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汉语词义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大的整体中多个层次的网络，对汉语词义的研究，就是要对这些网络关系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作者据此细致地考察了词义内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联系，考察了作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活动单位的词的意义，包含着的是物质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多重关系，考察了词义和词形的相互联系，考察了微观结构、中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的关系，考察了词的静态形式和动态形式的关系。这些考察都融进了词义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论证精当。

三、继承性和开拓性。我国历代对汉语词义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丰硕的成果，也有历史局限性。作者继承传统词义研究的成果，也扬弃了传统词义研究不足的地方，并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开拓性的探讨。作者吸收了现代语义学理论的养分，结合汉语的实

序二

许威汉

公元前600年—前300年，语言学的三个中心是中国、印度和希腊。8世纪阿拉伯语言学受到希腊语言学和印度语言学的影响而兴起。中国语言学在先秦时代独树一帜：《荀子·正名》阐述哲学见解而涉及语言理论；训诂学萌芽于先秦而兴盛于汉代，出现《尔雅》、《方言》等多部语言学名著；东汉许慎把所接触到的篆书、籀文、古文作总体分析，创立以偏旁为部首的编排文字的方法，立五百四十部，据形系联，析每字之结构，并加诠释，寻案本义，博采古训，旁及方言；汉代以后的音韵学受外来影响，佛教的“声明”启示“等韵学”的产生。从这些情况看来，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社会科学，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19世纪，有三种因素对语言的发展起作用：一是科学上的重要发现、发明以及各种学说、社会思潮对语言学产生影响；二是社会的需求推动语言学演进；三是语言学自身要求解决一系列内在问题，而三者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20世纪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它的应用范围大大超过单纯的数值运算，它与语言学结合，使语言学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研究有新的突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门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大大扩展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又出现了许多语言学的边缘学科。从这些情况看来，语言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社会科学，并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现代语言学诚然不同于古代语言学。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考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所以早期人们把语言学当作人文学。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为经学附庸，人们称之为“语文学”。现代语言学探索范

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功能、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历史发展。近年随着文化与文化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出现了语言与文化相关性的理论，主张科学的语言学科应向民族文化和民族语文传统认同并加以转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这当然不是先期人文涵义上的历史重复，而是中国语言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苏新春同志的《汉语词义学》就是应时代召唤而问世的。我国古代词义的研究固然早已开始，但是长期以来缺乏独立分科的系统研究，苏新春同志在前人认知的基础上，借鉴外来见解，深入探索，益以新知，建构词义理论框架，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汉语词义学》全书的组成包括结构篇、人文篇、方法篇、史论篇四大部分。其中结构篇是主体，核心内容是对词义本身的构成成分和属性的研究；人文篇对词义的人文表现进行了新探讨，为语言的人文性的认同提供重要的依据；方法篇综合提示历来词义研究的方法，丰富了学科方法论的内容；史论篇概述了古今词义研究的状况和路子，史论结合，以论带史。任何学科，原则上都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语言学科自然没有例外，《汉语词义学》也正体现出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与联系，以为建立词义学的坚实支柱。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就方法论而言，它是关于方法的学说，有哲学涵义上的方法论、逻辑学涵义上的方法论和各门具体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很长时期里，方法论主要是指思维过程中的方法论，适用于各门学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学、符号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都充当思维过程中的理论工具而进入方法论行列。至于学科自身的方法论，是处理学科资料、揭示规律而采取的特殊方法论，而又为哲学、逻辑学涵义上的方法论所驾驭。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方法论。王力先生总结治语言学经验八条，第一条便是要有科学方法论，说方法论不对，必将徒劳无功。苏新春同志撰《汉语词义学》，“方法”特列为专篇讨论，实是十分可取的。而在阐释汉语词义的全过程中，又注意到思维过程中的方法论和思维过程中理论工具方法论的运用，更是难能可贵。本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取得成功，与具有正确方法论

分不开。全书内容，在继承与创新方面显现许多特色，兹仅举二端略供读者参会。首先，词义分析除采取基本范畴分析法，在强调概念意义的同时，寓诸引申义的阐释，指示概念意义同联想意义及社会意义的区别。概念意义以逻辑为基础，属封闭系统；联想意义以经验为依据，属开放系统；社会意义强调动态的社会的词义分析，又与联想意义相交织。循此多角度多渠道而探求，词义系统网络将历历在目。

其次，词义分析能实事求是，重视借鉴现代语言学新成就而不随意牵合。比如总论说，汉语词义学本身就“未曾有过定格”。这是作者对汉语词义研究进行充分归纳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而又不牵合于一般对“语义学”的说解。有人在词义学与语义学之间画等号，说“词义学也叫语义学”（新版《辞海》），未免简单化了。我们知道，语义是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信息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领域交叉反映。欧美学者原先整理研析了词义演变的几种类型，提出词义扩大、缩小、转移说，这只是个别语义事实的观察分类，不是系统的语义研究。结构主义理论给语义学以影响，语义学便由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由研究一个词的语义变化转向研究词与词的语义关系。但结构主义语义学只以词与语素为研究单位，没有注意词组合成词组、句子的意义。后来乔姆斯基把语义同句法、音系并列为语言的三大系统，词汇学被视为语义学的一支，即所谓词汇语义学。而时过不久，有的学者认为语义结构应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有的学者则认为句法结构应以语义结构为基础，争论不休。在这过程中，语言学家又觉得在很多方面语义与句法界限难划分，与语用界限也难划分。语义学是什么，语义学家之间有分歧，哲学家、逻辑学家之间也有分歧，甚至连它能否成为独立的学科也无定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还兴起境况语义学，认定语义学应研究句子反映的境况，而不是研究句子的真值。凡此种种，认识的不一致，有目共睹。简单地把词义、词义学同语义、语义学等同起来看待，势将引致词义和词

义学研究受到干扰而陷入困境。然而本书有鉴于此，并深感汉语词义学本身“未曾有过定格”，进而力求从汉语实际出发，认真探讨，促使词义学纳入科学轨迹，着实值得称道。

仅如上二端，已可观本书卓然有所建树之大略，余毋庸一一备述。任何一种学说，都有补正发展余地，语言学说自无例外。本书有待来日补正，精益求精，自在情理之中。本书诸多真知灼见，则为词义学华构之所需，且将经过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而获得真理性的有力证明。本书的出版，良可志贺，特为之序。

序三

申小龙

两年前，当苏新春同志把他的《汉语词义学》初稿送给我的时候，我就深受鼓舞。这不仅因为这部著作科学地总结了当代汉语词义研究的丰硕的成果，也不仅因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汉语词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更由于这部专著的出现显示着我国语言学历史进程的一个新的时代——语义的时代。

纵观中国语言学两千多年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很有意思的曲线，即传统小学以语义的训释、析解为中心；而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则以语形的分析为科研最高追求；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的语形分析危机四伏，无论是句法分析还是词法分析，都开始引入语义知识，人们终于开始认识到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现象，是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脱离了语义则无所谓语形。而就在这时候，语义的苏醒迅速有了摆脱语形、建立独立的汉语词汇学与词义学的“自我”意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始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切入语义的独立研究。这股思潮和语法研究中的语义取向形成一股合力，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大思路的震荡下迅速地走向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前沿。我们可以说，中国语言学正在进入“语义的时代”。

中国现代语言学中曾经没有词汇语义研究的位置，这是一种十分深刻的文化错位现象。不要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缺乏系统的汉语词汇语义理论，就是具体的研究也是寥若星辰。据统计，1900年至1949年古汉语语法的论文共发表47篇，1950年至1980年猛增到284篇，增长率是504%。同期古文字的论文则由271篇上升到521篇，增长率是92%。而古汉语词汇的论文则由前50年的848篇下降

到后30年的472篇，下降了44%。在专著方面，后30年古汉语词汇的著作也只有2部，远逊于文字（42部）和音韵（8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语言学在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系的转化中，片面地将形式化这一欧洲近代科学的理想作为汉语分析的宗旨，始终未能形成汉语语义的系统研究的气候，因而语义研究长期萎缩在训诂学、文字学这些古老的学科内。

随着当代人类科学、文化语言研究中对人文因素的重新发现与肯定，汉语的语义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它首先表现为汉语词汇学的繁荣，诸如词汇学与训诂学划界之争、单音词与复音词研究、同义词研究、同源词研究等都先后形成了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语义研究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词义研究的异军突起。据对1980年起国内发表的古汉语词汇研究论文900篇的统计，尽管大部分仍是诠释具体字词的文章，但探讨古汉语词义理论的论文已有近200篇之多。“词义热”的兴起显示出汉语语义研究的日趋成熟。它表明当代汉语学者在使语义研究传统现代化的努力中找到了突破口。词义研究一开始虽然是纯语言学的研究，但是由于语言对于民族文化的本体论意义和语义作为文化阐释的基本依据，词义研究与文化研究能够迅速产生互动的效应，形成良好健全的学术生态环境，这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梦寐以求的境界。

在苏新春这部著作中，我们对当代汉语词义理论的各个层面获得了系统而又深入的了解。从本体论来说，在词义的基本属性方面，作者讨论了汉语词义的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概括性、具体性、静止性、运动性、系统性等；在词义成分方面，作者讨论了汉语词的深层义、表层义；在词义系统方面，作者讨论了汉语词义的微观结构、中观结构、宏观结构。从方法论来说，作者作为一位多年从事词义研究的专家，对汉语词义研究各种方法及其沿革作了详尽而又深刻的阐述。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对汉语词义的运动规律作了相当细致的刻画，例如有义位之间的词义运动，义位义向词位义的运动，词位义之间的运动等。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汉语词义理论的探讨充分汲取了传统训诂学的营养。例如在探讨词义的概括性和

具体性时，作者认为：了解了词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辞书释义较泛、注释文释义较窄的特点，并进而认识词义分化派生的内在制约因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传统训诂学对古籍的整理和文意的疏通为古汉语词义的研究廓清了理解障碍。传统训诂学对古汉语词义的认识成果和处理方法，显示出传统词义理论的相当高度，将成为汉语词义学的有机理论成分。汉语词义学的研究往往以训诂学提出的词义问题为突破口，以容纳了丰富词义现象的训诂典籍为重要参考材料，以挖掘整理重要训诂学家的词义见解为线索。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的汉语词义学可以视为传统训诂学语义理论的一种现代条理和创造性转化。这就使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着一种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明晰的思维轨迹的语言。这种语言体现着我国新一代语言学工作者的“世界观”，也预示着我国语言学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学术范型。

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词义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的研究。它研究的是规定一种文化的精神状态乃至生存状态的意义系统。苏新春在他的词义研究中正贯注着这种可贵的文化意识。在本书中他于“结构篇”之后专列“人文篇”，对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作了多方位的考究，从文化因素的消长进退看词语的产生和消失，从文化心理、习俗看词的命名和词义的演变，从文化的观念体系看词汇的系统，尤其对汉语词汇结构的具象性和辩证性作了深入的、富有创见的阐发。在本书的“史论篇”中，他首次提出了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人文价值、现代词义研究的人文主义学派问题，并对当代汉语词义的人文研究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展望，这在汉语词汇、词义学史的研究上独具慧眼，开风气之先。汉语研究中的人文主义思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句型文化》、《汉语人文精神论》、《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中国文化语言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对汉语的人文性和与之相适应的汉语研究的人文主义方法作了阐述，但这些阐述主要集中在语法方面。苏新春这部著作从词汇、词义的方面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汉语人文研究的新天地，